

静悄悄的革命：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与另类食物体系的形成

——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张璟¹ 郑风田¹ 倪国华²

(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²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安全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4)

提要：近年来，学界对社会运动的研究逐渐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本文突破了传统的针对政治领域中的社会运动的研究，以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为例，对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进行研究。社区支持农业运动是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典型代表，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社区支持农业运动是在食品安全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产生，不依靠强大的 NGO 和消费者组织，独自突破困境，实现发展，建立了另类食物体系，展现了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潜在力量。文中运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提炼出社区支持农业运动的话语体系，并据此分析了其动员机制和市场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支持农业运动拥有话语动员的能力，并通过吸引有着“文化共鸣”的人加入运动，而不断促进运动的发展；我国社区支持农业运动可以通过对传统工业产生方式的批判，建立新的认知体系，开创新的市场份额，这是其重要的市场影响。最后文章探讨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指出可以从社区支持农业话语体系的变迁、社区支持农业创造的政治机会，以及社区支持农业的组织行为等方向继续深入研究。

关键词：社会运动 社区支持农业 记号语言链 动员机制 市场影响

一、引言

传统社会运动的发生往往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利益之争，针对当权者的抗议、游行、示威也极易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认为社会运动就是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或反对某些特定社会变迁的体制外政治行为（赵鼎新，2005）。McAdam, Tarrow & Tilly（1996, 2001）更是将抗议、社会运动，以及革命等相互交织的集体行动现象归入到对抗性政治的概念中，从而使得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被限定在政治领域内。然而，近年来，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如计算机企业间著名的开放源代码运动、针对肯德基、麦当劳的抵制活动、争取动物福利的抵制活动、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抵制活动等等，这类社会运动的矛头从政府转向了企业（Davis et al., 2005; King & Soule, 2007）。不同于政治领域的社会运动，市场领域的社会运动往往采用教育和改变消费者认知、创造新的消费文化等方式，在已有的市场之外建立新的市场，从而另起炉灶，吸引生产者生产新产品，最后带来文化上的变革（Melucci, 1996）和新产业体系的建立（Rao & Giorgi, 2006）。与传统的社会运动相比，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没有激烈的社会冲突，但此类运动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并对市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世界范围内的反转基因食品运动、有机农业运动、社区支持农业运动（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下文简称 CSA），甚至当下正在我国进行的反对食物浪费的光盘行动。

本文力图对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其发生机制和主要影响。在众多社会运动案例中，本文选择以 CSA 为例，对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进行相应的研究。在中国，CSA 是兴起于 21 世纪初，由农民、普通消费者、NGO 志愿者、企业界精英和学界精英等群体共同参与，反抗主流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以在市场中创造可替代的食物体系，推广生态农业理念为目标之一，现已组建全国生态农业互助网络平台的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选择 CSA 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当前中国食品安全危机大爆发，CSA 作为安全食物的供给者，其影响与日俱增；二是 CSA 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成长历程艰难曲折，形成燎原之势的内在机制值得研究；三是揭开中国 CSA 开拓者和先行者的面纱，探讨其背后的价值追求，这对于理解我国市场领域里“另类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System）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仍旧存有争议。传统的社会运动学者将运动视为达成政治目标或政策目标的过程（Gamson, 1975），如 Tarrow（1998）认为社会运动属于抗争政治学，是基于潜在的社会网络和架构共鸣发展出的能够持续挑战抗争对象的运动；Tilly（2004）将社会运动定义为更为狭窄的对抗权威的运动，且使用存在于政治领域的与激进主义密切结合的抗议库（protest repertoires）；McAdam, Tarrow & Tilly（2001）除了将社会运动主要归于政治分析领域外，还对运动的关键特点做出界定，即扩散的边界、有限的正式组织、以更为高尚的名义从事杰出实践，以及持续不断的努力。

与传统定义相对，有学者认为不应将社会运动的定义局限在政治领域。如 David A. Snow（2004）认为“对抗性政治”这一术语的提出是一种概念霸权，它阻止了学者考虑和分析众多不直接与政府或国家相关的，发生在政治舞台之外的社会运动。Goodwin & Jasper（1999）也认为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仅仅聚焦在抗议者与国家的相互作用，忽视了由中产阶级发起的，带有挑战性文化符码（culture codes）的，并不以国家为敌对目标的运动。Hank Johnston & Shoon Lio（1998）更加详细的指出，在后现代社会中，制度之外的挑战已经出现，而这些挑战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多年之前的分析框架，特别是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集体行动视角，他们认为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应从传统的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

还有学者扩张了社会运动的概念，如 Snow, Soule, & Kriesi（2004）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定义，他们指出社会运动可以被认为是对现存制度权威的挑战或者保护——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或者是文化领域里的实践。还有学者指出社会运动不仅抗议现存的系统，而且加强了科学、艺术、技术或者一般知识上的集体生产（Moore, 1996; Frickel & Gross, 2005; Hargrave & Van de Ven, 2006）；另外，这些运动较传统的社会运动往往是非中央集权的，组织内包含的是松散联系的群体，这些群体独立地组织或者生产产品和服务来推动集体目标的实现（Siobhán O'Mahony & Beth A. Bechky, 2008）。

挣脱了“政治领域”这一约束条件，国外众多学者对市场、社会、宗教、医疗等领域内的社会运动进行了研究，如 Siobhán O'Mahony & Beth A. Bechky（2008）研究了市场中计算机企业间著名的开放源代码运动；Katzenstein（1998）研究了在军队和教堂中女权主义的抗争；Chaves（1997）研究了女性在宗教组织中争取权力的运动；Taylor（1996）研究了致力于帮助治疗产后抑郁症患者的社会运动。特别的，国外学者对市场领域中的社会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社会监管、市场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Davis et al., 2005; King & Soule, 2007; Weber et al, 2008），Siobhán O'Mahony & Beth A. Bechky（2008）更是指出，在市场生产领域里发生的社会运动已经带来了诸多创新，做出了显著的经济贡献。

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其能够进行市场创新并开创一个新的市场份额。新市场的产生是经济和文化变迁的重要引擎，但是新市场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它们往往是由动员了必要的经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资源的集体行动开创的（Fligstein, 1996; Swedberg, 2005）。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社会运动能够扮演这一市场创新

过程的核心角色,例如,美国的禁酒运动、啤酒的“精巧酿造运动”(Craft Brewing Movement)、资源回收和可替代能源运动、环境保护运动、草食运动(Grass-fed Movement)等,这些运动中都动员了特定的目标群体——消费者、销售者和生产者,并且已经催生了新的市场产品(Weber, Heinze & DeSoucey, 2008; Carroll & Swaminathan, 2000; Rao, Morrill & Zald, 2000; Schneiberg, 2002; Lounsbury, Ventresca & Hirsch, 2003)。与常规的技术创新不同,社会运动驱动的市场创新往往使新市场带有一定的道德价值特色以及对传统工业产生方式的批判(Rao, Monin & Durand, 2003; Rao & Giorgi, 2006; Fourcade-Gourinchas & Healy, 2007)。

反观我国,对社会运动的研究还局限在政治领域中,如应星(2007)对草根动员和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机制进行研究;施芸卿(2007)以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对机会空间的营造进行分析;张磊(2005)对业主维权运动进行了研究,考察了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在内的、一个具有分利性质的房地产商利益集团与业主的对抗。在这些研究中,政府都是社会运动诉求的对象、目标或是调停方,因而其明显是政治性的(McAdam, Tarrow & Tilly, 2001)。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消费方式在改变,个人主义在蔓延、意识形态呈现出多样性,且通信技术等高科技领域里不断涌现出创新。这些变化已经衍生出新的社会身份,且原有的社会身份也在发生改变。因此,后现代的复杂性催生了众多小的、多样化的、分散的群体,他们表达不满和挑战的方式已超出了传统的政治领域(Johnston Hank & Shoon Lio, 1998)。基于此,本文倾向于采用斯诺(Snow, 2004)等人更为宽泛的社会运动的概念,认为社会运动是松散的组织化联盟,它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鲜明的反抗现有的社会和文化实践。这一概念允许改革者、革命者、底层人群和精英群体的参与,允许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反动的策略和行动,且运动的目标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或文化领域。

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也出现了众多分散且多样的群体,出现了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在我国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人们的饮食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部分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已经行动起来,共同发起了食品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社区支持农业。

在国外,CSA于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日本、瑞士等国,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是世界“本地食物运动”(local food move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本地食客”(locavores)作为一条新词汇被加入到牛津美语大辞典中,这无疑是对日益兴起的“本地食物运动”的一种认可(Dawn Thilmany et al, 2008)。一本名为《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的书中写到,在美国,一场规模逐渐扩大的社会运动正在兴起,这场运动承认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为食品所付的钱大部分都落入运输、加工和营销公司囊中,这些食品虽然源于农场,但收益却不能归农民自己所有。实际上种植了食品的人却不能得到足够的收入维生。于是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起来支持农民,他们直接向种植者购买产品,绕过了超市、中间商和国际运输系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了新鲜的、本地产的应季食物,这个系统就被称作社区支持农业(伊丽莎白·亨德森, 2012)。由此可以看出,国外CSA的兴起与保护本地农业、节约能源有很大关系,一定程度上带有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以美国为例,该国的CSA的产生与当地反对工业化农业生产体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不公平贸易有关。

与国外CSA兴起的背景有所不同,中国CSA的兴起与中国当前的食品安全危机有关。有诸多学者指出,中国CSA是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重视的背景下发展起来,且该模式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安全的食品,确保了食品安全(朱清海, 2012)。石嫣(2012)认为由于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加剧了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和对工业化食品体系和全球化食品供应系统的不信任,使得中国的CSA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刘飞(2012)等也认为,CSA是一种以区域性、安全性、公平性为特征的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是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生态型都市农业。因此,与美国的CSA相比,我国的CSA更多的是承担起保障食品安全的任务,如陈卫平(2011)给出的CSA的定义认为,CSA是农产品直接销售的一种模式,它是一种在农场(或农场群)及其所支持的社区之间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形式。消费者成为农场的用户,并承诺在农场整个生产季节给予支持。用户支付预订款(按照季节或者月份支付),而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作为回报,直接运送给订户或分配给销售网点。

现有的关于CSA的研究文献主要从CSA的特点、CSA的发展机制、CSA的作用、CSA参与人的特点等四

个方面展开。首先, CSA 模式具有密切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缩短生产者和消费者距离的特点, 如 Kolodinsky et al (1999) 验证了 CSA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团结一致的关系; Donahue (1994) 对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 CSA 农场进行研究, 发现该农场为了维持农场主与会员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动程度, 举办了各种活动, 甚至最后不惜通过缩减会员数量来达到这一目的。第二, 在 CSA 的发展机制方面, 美国 CSA 的先行者伊丽莎白·亨德森 (2012) 认为, 过去的 20 年里, 分散在美国各地的 CSA 汇聚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运动力量, 其关键的机制在于它拥有诸多社会力量的参与, 如众多环保组织和市民团体, 在众多外部力量的协助下, CSA 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高效的政策部门, 并发起了美国可持续农业合作运动, 一起进行了农场法案的政策游说, 并促成了美国食物政策方面的改变, 可以说, 在美国, 本地购买运动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 另类食物体系正在挑战传统的工业化农业。第三, 在 CSA 的作用方面, Feenstra (1997) 认为 CSA 促进了另类食物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他指出 CSA 是本地食物系统的一种形式, 这种食物系统提倡本地生产, 本地消费, 支持“吃在当地、吃在当季”, 呼吁减少食物运输里程, 支持当地农业生产。最后, 在 CSA 参与人的特点方面, 文献中对 CSA 的消费者特点关注较多, 研究结果认为 CSA 的消费者是一群关心食物质量、关心环境健康、关心食物生产者的人, 如 Cooley & Lass (1996) 对美国马赛诸塞州艾莫斯特市 CSA 的消费者进行调查, 发现他们加入 CSA 的主要动机是关心产品质量、支持本地种植, 关心环境和食品安全; Ohara & Stagl (2001) 对纽约州 71 个 CSA 的会员调查显示, 人们加入 CSA 的八大主要动机是获得新鲜蔬菜、获得生态种植的蔬菜、想要支持本地农民、关心环境、减少包装、知道食物来自哪里, 以及希望为健康做些事情; Delind & Ferguson (1999) 发现女性参加 CSA 的比例较高, 他甚至将 CSA 称为是一种女性运动。在美国, Perez et al (2003) 发现加利福尼亚州的 CSA 的会员拥有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 Ostrom (2007) 发现密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 CSA 会员会食用更多、更新鲜以及更丰富品种的蔬菜, 很少去超市购物并且转向了更为健康的饮食习惯。而当前有关 CSA 的生产者的研究较少, 现有 Lass et al (2003) 率先利用美国全国 CSA 调查的资料分析得出, 94% 的 CSA 农场采取有机耕作的方式等。

综上所述, 当前, 少有文献对我国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及其相关影响进行研究。而从 CSA 的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到, CSA 作为“本地食物运动”的一部分已经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且改变了其参与者的认识和行为, 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 并推动了其他国家, 如美国, 另类食物体系的建立。但由于中国 CSA 运动产生的背景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 中国也不同于其他国家拥有强大的支持 CSA 的 NGO 和消费者组织, 因此作为食品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 中国 CSA 的发展有其特殊的困境, 但中国的 CSA 能够突破困境, 发展壮大, 这又显示出社会运动在市场领域里的生命力。正是基于此, 本文以中国 CSA 的发展为例, 探寻我国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力量之所在, 通过分析 CSA 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对“另类食物体系”的影响, 总结社会运动在市场领域中的作用机制和重要影响, 同时弥补我国学术界对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研究的不足。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

本文使用案例研究法, 主要进行两个分析, 一是总结 CSA 的开拓者所秉持的生态农业理念及其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 并以中国 CSA 的先锋农场——北京市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例, 分析我国 CSA 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二是通过实地访谈, 探寻 CSA 参与者对生态农业和工业化农业的认知, 分析 CSA 参与者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认同, 总结 CSA 运动的动员机制及其主要影响, 本文收集了多种形式的定性数据, 这些数据主要是参与到 CSA 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言论, 言论的来源包括访谈、观察到的资料, CSA 的出版物、网站、会议文集、在线论坛以及新闻报道等。

纵观中国 CSA 的发展, 从最初生态农业的试验至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建立, 再到当前百花齐放的局面, 生态农业的理念一直贯穿在 CSA 的发展历程中, 成为中国 CSA 运动的精神旗帜。因此, 在进行第二个分析的过程中, 本文使用了记号语言链法 (semiotic chain analysis), 以分析生态农业的文化理念在 CSA 运动中的作用机制。记号

语言链法是符号语言学的一种方法，社会学中经常利用该方法进行参与者话语体系的分析（Greimas, 1983）。在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利用语言符号编码（codes）来研究文化在组织和动员机制中的作用已经有所突显（Swidler, 1986; Jasper, 1997; Benford & Snow, 2000）。文化编码（cultural codes）是在一个运动中，以公共范围内多数人认同的形式而存在的话语体系，它们可以被活动者列出来且被详细阐释，并以此来创造一个存在于运动中的特殊框架，创造一个更为广范的根植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文化共鸣”，这种共鸣可以吸取成员加入并且形成一个多样的群体成员来使得运动的外部目标合法化（Snow & Benford, 1988）。而 Barley（1983）指出，运用该方法研究文化，研究者的任务是寻找到相关的话语表述、话语内容，以及连接表述和内容的规则，这种规则一般利用话语修辞中的比喻¹或转喻²建立表述和内容的联系，如由“皇冠”联想到“帝王”，以此描绘出秉承一种文化的群体使其世界具有独特意义的话语符号。Barley（1983）以殡葬师的文化编码为例，对话语分析中记号语言链方法的使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描绘出该文化编码的领域（domain）、对立方（opposition）、表述集（a set of expressions）、内容集（a set of contents）、连接表述和内容的规则（rules），并对该文化编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总结和阐释。

本文借鉴了记号语言链的方法来识别 CSA 的参与者使用的话语结构，文中 CSA 话语体系文化编码的领域涉及 CSA 和化学农业，二者是对立方；构成二者话语体系的表述集主要是被访者的言论，内容集主要是抽象出的被访者言论的目的；比喻或转喻的对象是生态农业，且以生态农产品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的主要原则为规则尝试推断被访者表述的目的和内容；其中，生态农业生产环节的原则可包括原料有机、自然生长、人工管护，流通环节的原则可包括地点认证、渠道透明、质量管控，消费环节的原则包括互信互利、健康低碳。本文进行记号语言链分析的步骤是：首先，收集和整理被访者的相关表述；其次，根据生态农业的相关原则作为规则对表述进行分类；再次，从分类中分析出表述的目的和内容，并识别表述和内容之间比喻和转喻性的关系；最后，将内容抽象至内涵层面，总结该文化编码的价值意义。本文用于识别 CSA 话语体系的文化编码以二元的形式阐述了一个涉及优劣判断的二元价值领域，这一文化编码的两个领域是两个价值相左的极端，一个是受人欢迎的，一个是不受人欢迎的。

文中所使用数据的核心是 9 个半结构式访谈，其中 CSA 农场主 7 位，消费者 2 位，访谈时间集中于 2013 年 3 月。核心数据的详细情况介绍如下：首先，本文重点研究的案例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它是中国 CSA 的先行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产学研基地，自小毛驴市民农园建立起，笔者即关注了该农场的成长与发展，参与了小毛驴的众多活动，并对其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访谈。

其次，本文通过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负责人 L 先生获得了一个在北京市影响较大的 20 个 CSA 农场列表，根据石嫣（2012）对当前 CSA 的四种分类，作者对每类 CSA 都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农场进行实地访谈，共访谈 7 个农场，包括：一、由小农为生产主体的 CSA，如陈艳红家庭农园、美田阳光农场、鑫农夫庄园；二、由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 CSA，如一墩青农场发展促进会；三、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 CSA，如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三分地有机农场；四、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 CSA，如小毛驴市民农园。所访问的生产者遍及各个经验范围，从新手到最初进入这一领域的先锋（拥有 10 年的 CSA 经营经验）。他们的地理位置遍及整个京郊及河北张家口等地。他们从事的 CSA 经营项目主要包括种植业，如主粮种植、蔬菜种植，及养殖业，如养牛、鸡、猪等。

七个农场及农场主的详细信息列举如下：

表 1 七例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基本信息表

农场名称	创办时间	农场规模	被访者姓名	年龄
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	2002 年 3 月	1700 亩	J 女士	45

¹ 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

² 转喻是修辞手法的一种，用与被修饰对象相关的其他事物来指代被修饰对象。

小毛驴 市民农园	2008 年 4 月	330 亩	S 先生	40
陈艳红 家庭农园	2010 年 3 月	6 亩	C 女士	45
美田 阳光农场	2010 年 6 月	80 亩	L 女士	38
三分地 有机农场	2010 年 8 月	130 亩	L 女士	38
一墩青农村 发展促进会	2010 年 10 月	100 亩	Z 女士	49
鑫农夫庄园	2010 年 12 月	100 亩	T 先生	35

最后，作者以一个综合的档案数据库补充了实地访谈数据。作者获得了当前网站、微博上关于 CSA 的数据，以及一些与 CSA 相关的书籍，这些书籍是被访者推荐的，如石嫣的《我在美国当农民》、伊丽莎白·亨德森的《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等。另外，作者还参加了第四届全国 CSA 大会，并获得了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 CSA 大会的会议论文和资料手册。这些档案资料可以协助本文对 CSA 的生产者的研究进行记号语言链的分析，并评价受访者言论的稳定性。

四、星星之火，燎原之势：中国 CSA 的发展历程

CSA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日本，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美国自 1986 年建立第一个 CSA 农场至今，其全国 CSA 农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5880 家（Local Harvest, 2013），而在英国，以查尔斯王子为代表的生态农业的支持者将英国的生态农业带上了有机农业的道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大力发展了工业化农业，而片面追求粮食增产，导致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质疑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并对此忧心忡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温铁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温铁军就开始做农村试验，推广生态农业，在长期的实践研究中，他对当前的工业化农业进行了众多的批判，对生态农业的价值理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付诸实践。在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方面，温铁军（2006）根据常年在各地农村的考察经验认为，在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越是追求产量型农业的现代化，越是强求农民靠农业增收，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水资源破坏就越严重；化学化农业和设施农业（地膜和大棚）生产越是普遍，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施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养殖业使用的催长激素、抗生素和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和有害成分就越多，土壤有机质下降越快，毒化越严重，环境污染越严重，对农产品生产和居民食品安全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越是在大城市集中搞“菜篮子”工程、“万头猪场”、“万头牛场”等大规模农业，就越会造成大规模牲畜排泄物的深度污染和防不胜防的人畜交叉感染疫病。工业化农业的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农业应该怎么办？温铁军就此提出，农业是一个和自然资源高度结合的产业，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搞不了，那么就恢复到生态化、多元化，发展生态环保型农业，回归传统农耕方式。温铁军（2010）指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粮猪型”小农家庭其生产过程与自然合一，生产过程几乎没有废物，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等有机物都实现“资源生态化”，村社内部是一个简单的，不依赖外界输入也可大体维持能量均衡的生态循环。传统的生态农业根本不产生现代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的环境立体交叉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等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

温铁军对工业化农业的批评和秉承的生态农业的理念得到了一批乡建志愿者的认同，他们同温教授一起，开始探寻“化学农业”之外的农业发展道路。2003年7月，温铁军教授、晏阳初先生的后人晏振东先生、翟城村委会，以及邱建生等乡建志愿者共同发起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那里进行乡村建设和生态农业的试验；2008年4月，温铁军协同其博士生石嫣及翟城村试验的众多参与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建立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开启中国 CSA 的发展之路。

北京市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 CSA 的开创者，它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 CSA 运动发展的艰难曲折。小毛驴市民农园名义上创建于 2008 年 4 月，但它的前身是位于河北省翟城村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当前，小毛驴市民农园占地 230 亩，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下、京密引水渠旁，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在经营模式上采取 CSA 经营理念，全程自产自控，进行 PGS（Participated Guarantee System）参与式保障，已经成为中国 CSA 的样板农场。从 2003 年至今，小毛驴市民农园已经成长了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试验生态农业直至探索出 CSA 模式并引发全国范围 CSA 运动的十年。

在翟城村，乡建学院管理着 60 多亩的耕地，耕作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坚持进行生态农业的试验，期间田间地头满是荒草，一度成为村里农民的笑柄。之后，学院派人去香港学习了永续农业，将养殖和种植结合，多余的草用来堆肥，实现了农业的生态循环。虽然实现了生产的生态化，但农场的发展依然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一是农场远离消费市场，如何建立消费者与耕作者的信任，使其认同成本高，价格贵的生态农产品的价值？二是对新鲜度要求很高的农产品如何能够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乡建学院的志愿者们想出了“认购”的办法，即消费者可以选择一个地块，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该地块生长的农产品。有一些人大教授成为乡建学院生态大米的首批认购者，但生态农产品在当时市场上的影响仍是微乎其微。为了建立消费者与耕作者之间的信任，挂职在河南兰考县的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还一度采取了“教授卖大米”的方法，2006 年 1 月，何教授带领两位兰考县的农民前往北京出售“无公害”大米，但 10 吨大米进京一周，只卖出 100 多斤。虽然何教授及同行志愿者在市场上极力宣传“无公害”大米的好处，但少有消费者对此表示理解和认同。就这样，先行者的生态农业试验一度陷入瓶颈。

翟城村遇到的困境引发了生态农业实践者的思考，要想突破瓶颈，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经营生态农业。2008 年春天，北京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在柳林社区建立了一个生态农业产学研基地，此次的生态农业试验以 CSA 的模式出现。由于农场距离消费市场近，消费者可以亲自到农场参观检查，亲自体验小毛驴的生态农耕文化，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增进了双方的信任，也促进了 CSA 生态价值理念的推广；另外，小毛驴的产品销售采用直销配送的方式，没有了中间环节，产品的质量、可追溯性等就更有保障；小毛驴以此冲破了翟城试验的瓶颈，拥有了稳定的客源，达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理解、信任和相互支持，成功实现了 CSA 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建立的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国内最为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由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到苏丹红，由染色馒头到毒豇豆，各种食品安全丑闻纷纷曝出，社会在震惊之余，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来工业化农业的危害，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接受并认同小毛驴市民农园传递出的生态农业的重要意义，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以行动做出改变，不断加入到 CSA 的前进队伍中来，如 2013 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两位应届硕士毕业生，坚持生态农业的理想，去往广东珠海开办了自己的 CSA 农场，命名为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

CSA 在中国萌芽并发展至今的十年是波折的十年，中间经历了非议、漠视，甚至中断，但在一群有着坚定理想的人的努力下，CSA 已愈来愈被社会所承认。在 21 世纪前十年，正式运营的 CSA 农场只有 15 家，2008 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CSA 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如图 1 所示，截止到 2012 年 12 月，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已出现约 80 家 CSA 组织；从 CSA 的会员数量来看，参与 CSA 的消费者数量也不断增多，仅以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例，该农场的 CSA 成员从 2009 年的 54 户增加到 2012 年底的 1000 多户（第四届 CSA

大会，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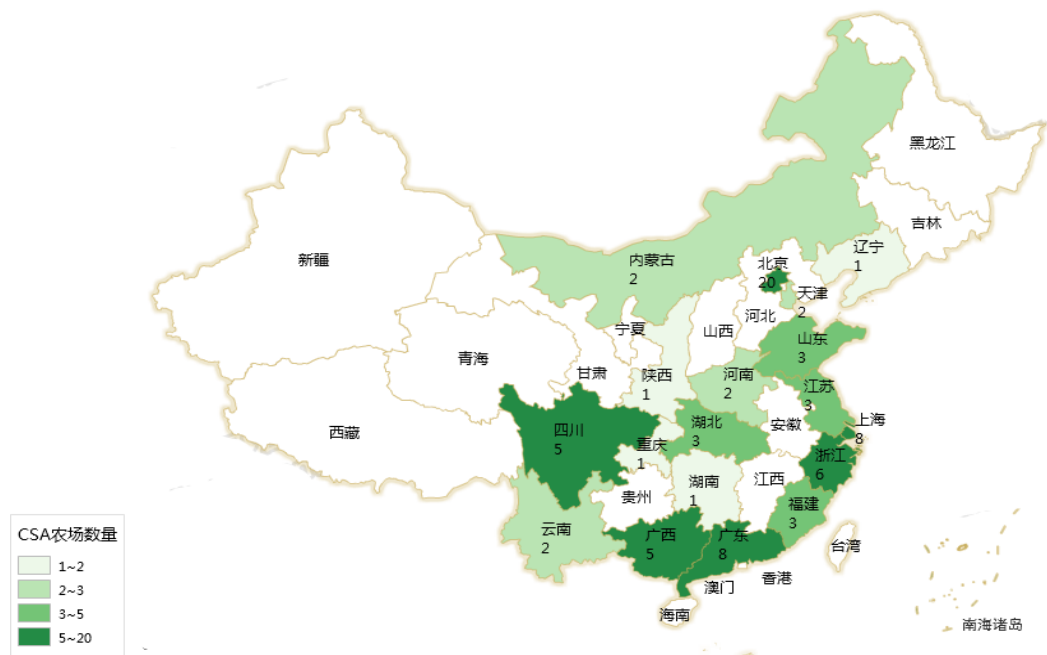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 12 月全国 CSA 农场数量分布图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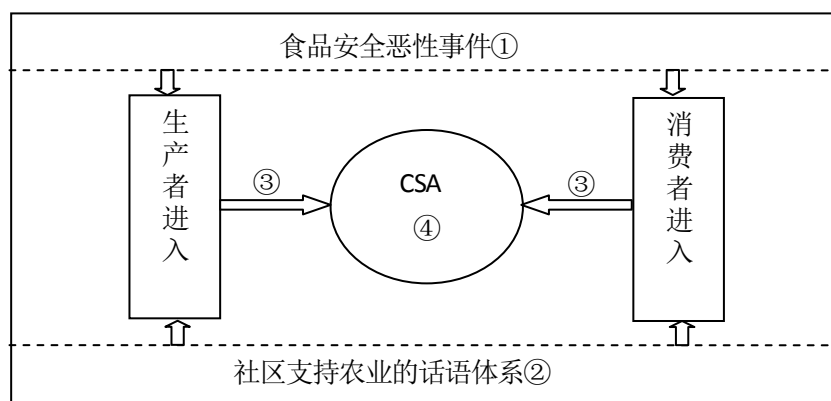
相较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明显属于弱质产业，希望通过经营农业获得超额利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难以做到。在本文所访谈的众多案例中，CSA 的生产者往往是从事着辛苦的农业劳动而又仅仅获得微薄收益的人，甚至有些生产者都是在亏本运营，如北京三分地有机农场。然而，作为世界 CSA 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 CSA 运动在近年来有迅速崛起之势，那么为什么这一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会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是什么人在推动它的发展？它又拥有怎样的动员机制和重要影响呢？

五、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和重要影响：以中国 CSA 的发展为例

（一）社区支持农业运动的动员机制分析

Snow & Benford（1988）认为话语可以被活动者列举且被详细阐释出来，并以此来创造一个更为广范的根植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文化共鸣”，这种共鸣可以吸取成员加入并且形成一个多样的群体成员来使得运动的外部目标合法化。经过众多的资料分析和深入的实地访谈，本文认为，新的话语符号在 CSA 的动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认为其按照图 2 的逻辑实现了参与者动员。

³ 根据第四届 CSA 大会所登记的 CSA 农场主信息整理所得。



①社会动员的现实背景；②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
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值认同；④围绕 CSA 形成的动员机制

图 2. 社区支持农业的动员逻辑图

1. 社区支持农业社会动员的现实背景

赵鼎新（2005）指出，在威权国家中，我们应该关注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所打动。在本文所关注的案例中，CSA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被其话语所打动，其重要的背景是中国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但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让人胆战心惊、食之难安。虽然政府试图利用严格的监管体系和严厉的处罚措施，从源头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但 2009 年之后，食品行业内的各种安全事故依然层出不穷，各种食品安全事故频频爆出，从整个食品行业的生产、加工、经营等各个环节，各种“行业潜规则”一次又一次触动公众的神经，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面对食品安全危机，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行动起来，在主流的工业化农业食品系统之外，建立了新的“另类食物系统”，CSA 就是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国的 CSA 蓬勃发展起来，CSA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逐渐增多，那么是什么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至 CSA 中来呢？本文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食品安全出现危机的背景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安全、健康、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的价值认同。

2. 社区支持农业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

此部分记述了 CSA 生产者对自身和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食物的评价，并从其评价中探寻 CSA 的话语体系。由于话语体系可以以价值判断的形式体现于被访者的言论中，因此本文通过分析 CSA 生产者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搜集的网络中宣传 CSA 的相关言论，来总结 CSA 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分析 CSA 生产者的价值理念。

从温铁军教授的翟城村试验，至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立，再到 CSA 在全国范围内的百花齐放，CSA 先行者们对工业化农业的反思和对生态农业价值理念的探索一直贯穿在 CSA 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探究当前 CSA 的生产者是否受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本文使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尝试识别并分析这个可能普遍存在于 CSA 行动中的文化编码，这种编码对于 CSA 的参与者来说是有意义和有凝聚力的。当然，CSA 的旁观者或者反对者可以对此编码进行反驳，并且反对其中文化和行动之间具体的联系。比如，一些工业化农业的支持者可能会反对 CSA 自然性方面的文化编码，否认好的营养来自食物的自然纯净，而是认为好的营养需要人类的干预。

本文仅使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展现 CSA 的话语体系。下文列出了三个拥有对立结构的文化编码：真实性与虚假性，利他性与私利性，自然性与造作性。文化编码包括两个部分：CSA，被标以积极的，有道德的标签；而另一部分，就是现存的工业化农业生产体系，被打上负面的，不道德的标记。图 3 至图 5 分别以语言链的形式展示了文化编码及其组成部分。在每一幅图的上部分，显示的是编码的内涵维度，这将 CSA 和工业化农业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层面上进行评价；每幅图的下半部分显示了其编码的外延维度，主要记录了 CSA 生产者言论的相

关表述及其主要内容。

（1）真实性与虚假性

从所获资料分析可以发现，CSA 的生产者对自身产品的评价往往都提到了真实性的价值，而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产品则带有对其虚假性的批判。图 3 利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整理了被访者的相关言论，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 CSA 生产者在真实性方面的道德关怀。例如，“一墩青”的理事长 Z 女士评价 CSA 的产品时说：

“我们的产品都是真的，都是自己一点一滴养出来的东西”，而在评价工业化农业的产品时，她说：“这些东西假货多，比如牛奶，不是添水就是添药，没有真东西。”（一墩青理事长 Z 女士语）

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的园主 J 女士说，

“农业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从事农业的人是与自然沟通的人，农业就是我的第二职业，农耕不仅是生产，更是一种文化，一份工艺和遗产。在我看来，现在的社区支持农业是在返璞归真，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的从事食物生产。”（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 J 女士语）

鑫农夫庄园的园主 T 先生进一步表示：

“我们和会员之间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会员为什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真真正正做事的。消费者可以随时到农场来，亲身体验农场的生态环境如何，使用的耕作技术如何；消费者也可以随意品尝农场的食物，检验是不是真的好东西。”（鑫农夫庄园园主 T 先生语）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负责人 S 先生还指出，

“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都是使用传统的生产耕作方式，使用的是自留的种子，是真实自然的，而工业化的农业大多使用转基因的种子，是有违自然规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 S 先生语）

图 3 详细列举了被访者的相关言论，并对该言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阐述。

（2）利他性与私利性

从实地访谈中可以感受到，CSA 的生产者有着很强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他们关心多数人的健康，关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注子孙后代的未来发展；因此他们选择 CSA 的生产方式，采用传统的、保护性、可持续性的耕作方式生产安全的产品，希望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探索。图 4 反映了 CSA 的生产者在利他性层面的话语。在此列举一些农场主的相关表述，如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负责人 S 先生表示：

“小毛驴不仅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注重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注重公平的交易环境的培育，我们希望农民能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种植，为市民送去安全健康的食品，也希望市民能够认同和信任农民，为健康的产品付给农民一个满意的价格。”（小毛驴市民农园 S 先生语）

“一墩青”理事长 Z 女士也表示，

“我做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村民的健康，为了更多的城市人的健康；从 2010 年到现在，我的农场其实是不赚钱的，一是由于生产成本低，二是由于我做的是主粮生产，市场需求有限，但是为了自个儿的理念，我会坚持下去。”（一墩青理事长 Z 女士语）

鑫农夫庄园的 Z 先生更是指出了为了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坚持 CSA 的必要性。他认为，

“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生态环境好、环保健康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整个农场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害虫益虫并存共生、平衡协调，整个农场是一个具有丰富物种的田园，在那里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农业模式对子孙后代肯定是有益的。”（鑫农夫庄园 Z 先生语）

（3）自然性与造作性

自然性层面的话语体系在被访的 10 位农场主中都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他们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规律的遵循都在其言论中有所体现。图 5 用访谈中得到的农场主的言论对 CSA 自然性层面的话语做出直观的阐释，如“一墩青”的 Z 女士说：

“我们的东西是很自然的，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不加农药化肥，使用传统农耕技术，产品质量好，营养高，口感好！”（“一墩青”Z 女士语）

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的 J 女士表示，

“我们的庄园水很好，是山泉水，也是富硒水，整个生产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只使用有机肥料，我们使用的果袋都是环保型的，种植的苹果树都是在阳光充足、地理位置好的地方生长。我们倡导回归自然，遵循植物内在生长的动力，良心种，良心得；我们尊重规律，尊重大自然，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逻辑，顺应四时，最后收获自然美好的果实。”（北京乐和仙谷 J 女士语）

鑫农夫同样强调，

“我们的产品是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回归田园，继承传统文化，用传统技术，吃传统产品，享受自然、纯粹的生活。”（鑫农庄 T 先生语）

三分地有机农庄的庄园主 C 女士也表示，

“我种植的食物都是自然健康的，农场的种植方式是生态的，无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的种子，全部都是农家肥，我们保证了作物的营养，作物都是自然生长，没有虚假水分，口感好，味道浓，更好吃。”（三分地有机农庄 C 女士语）

图 5 详细阐述了 CSA 的生产者自然性层面的话语体系。

（4）小结

由上述分析可知，CSA 的话语体系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道德关怀，分别是真实性、利他性和自然性。依靠这一话语体系，CSA 已经成功动员了生产者的参与，如 CSA 的生产者们坚持使用生态种植的方法，生产安全健康的食品，他们注重环境保护和土地可持续利用，他们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他们关注城市人的健康，关注公平的城乡关系的建立。与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相比，CSA 的生产者体现的更多的是人文和道德上的关怀，这种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食物生产模式，按照这一模式生产出的食物带有的是安全、生态、环保、健康的标签。在我国食品安全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CSA 以其创造出来的追求真实、自然、安全、健康食物的话语体系，吸引着众多有着相同价值认同的人们加入。值得一提的是，首先，中国 CSA 运动的价值理念同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各种“另类食物运动”的价值理念十分相近，如国际慢食运动（slow food）秉承食物必须符合优良、清洁和公平三大标准（佩特里尼，2010）；美国草食运动（grass-fed）持有真实、可持续和自然性的价值导向（Weber et al, 2008）；其次，与其他国家 CSA 运动话语体系的不同之处是，中国 CSA 运动的话语体系主要来自精英领袖的倡导和生产者的觉醒，这与日本、美国等国依靠强大的 NGO 宣传和消费者组织有所区别（伊丽莎白，2012）。最后，本部分以一个 CSA 青年志愿者 W 小姐对 CSA 和工业化农业生产产品的评价作为结束语，这句话是 CSA 话语表述吸引和凝聚力的一个形象体现，W 小姐说：

“冰冷的机械和妈妈的味道，哪个更利于人类健康快乐的成长，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CSA 志愿者 W 小姐）

图 3 真实性 VS 虚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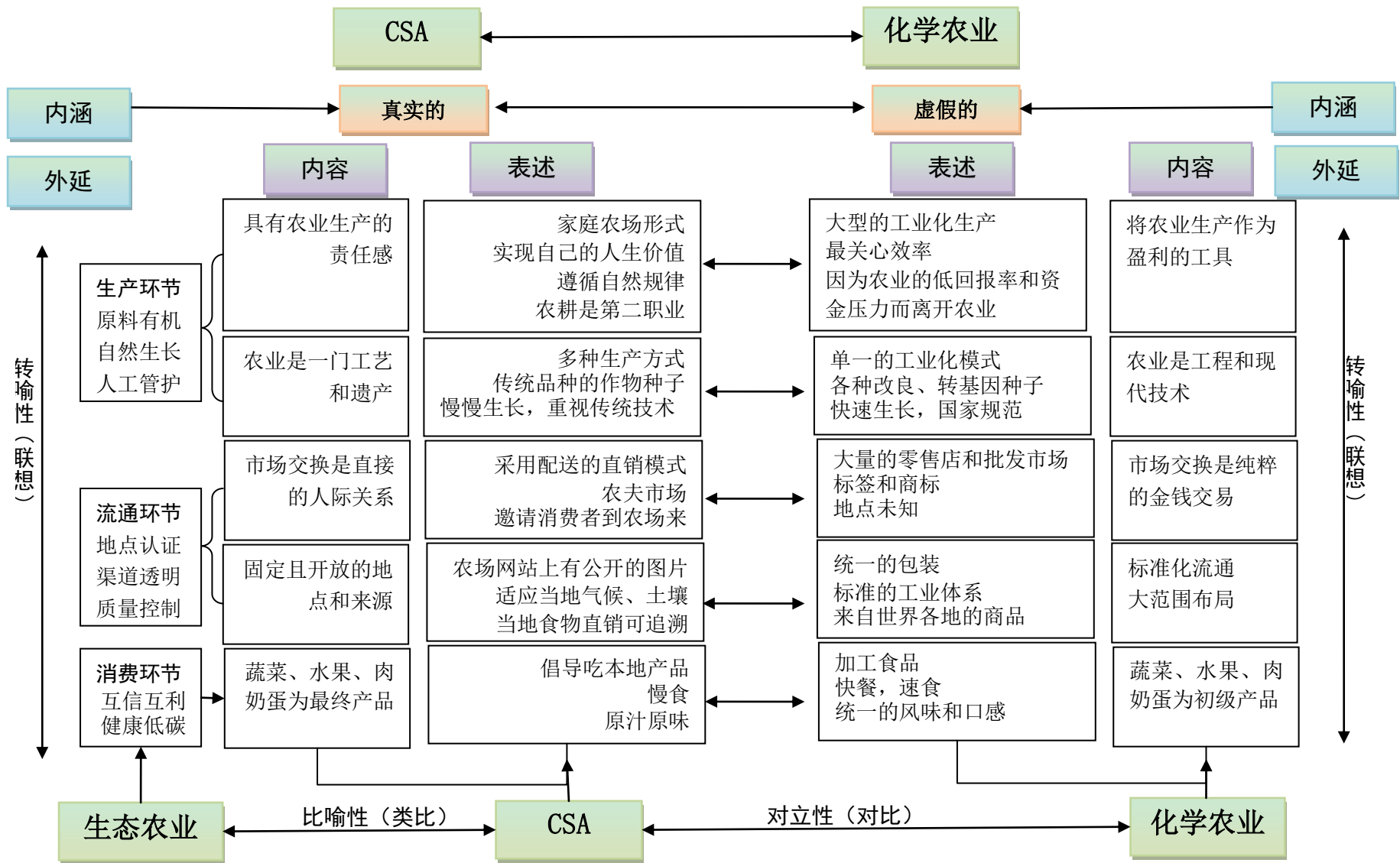


图 4 利他性 VS 私利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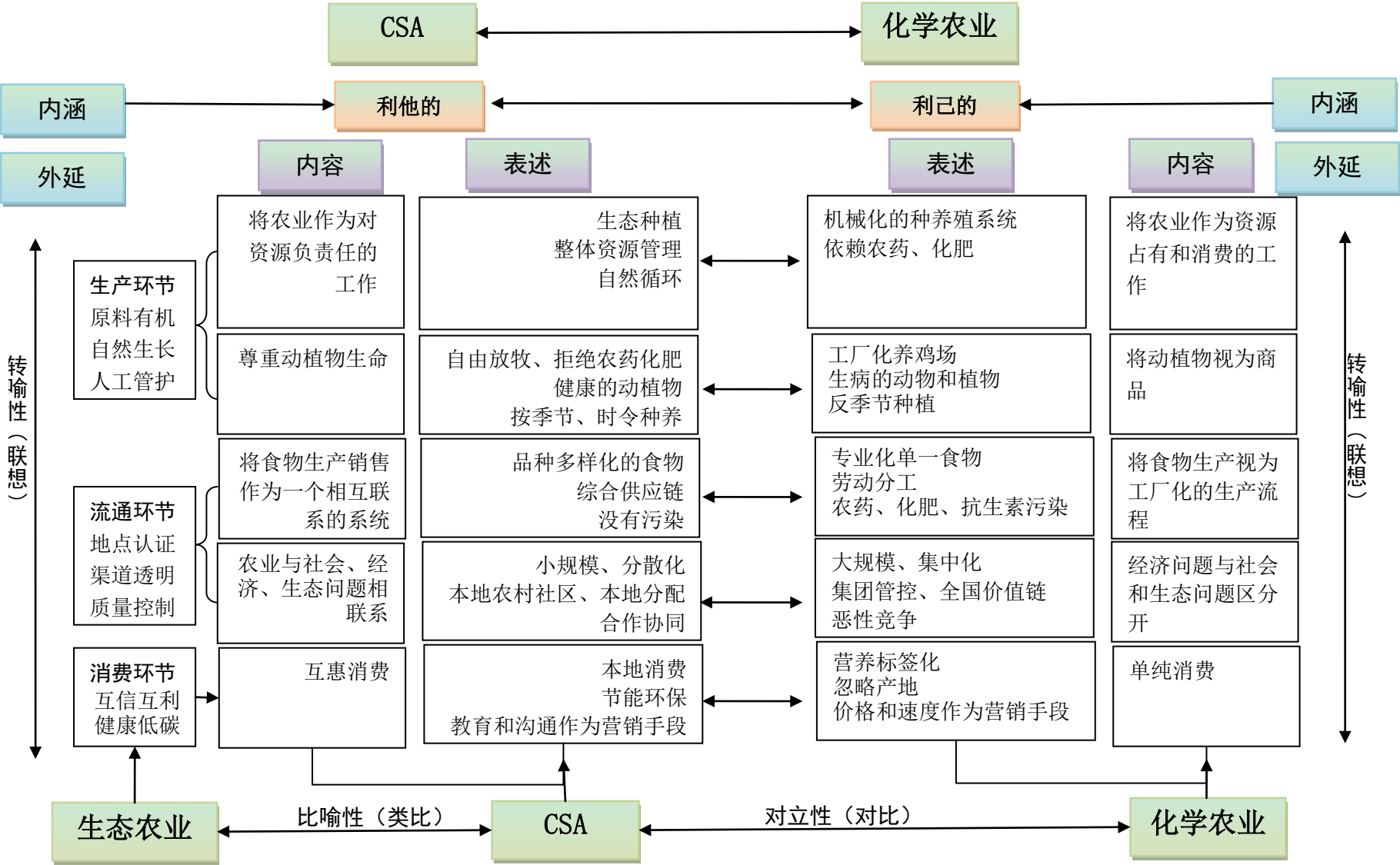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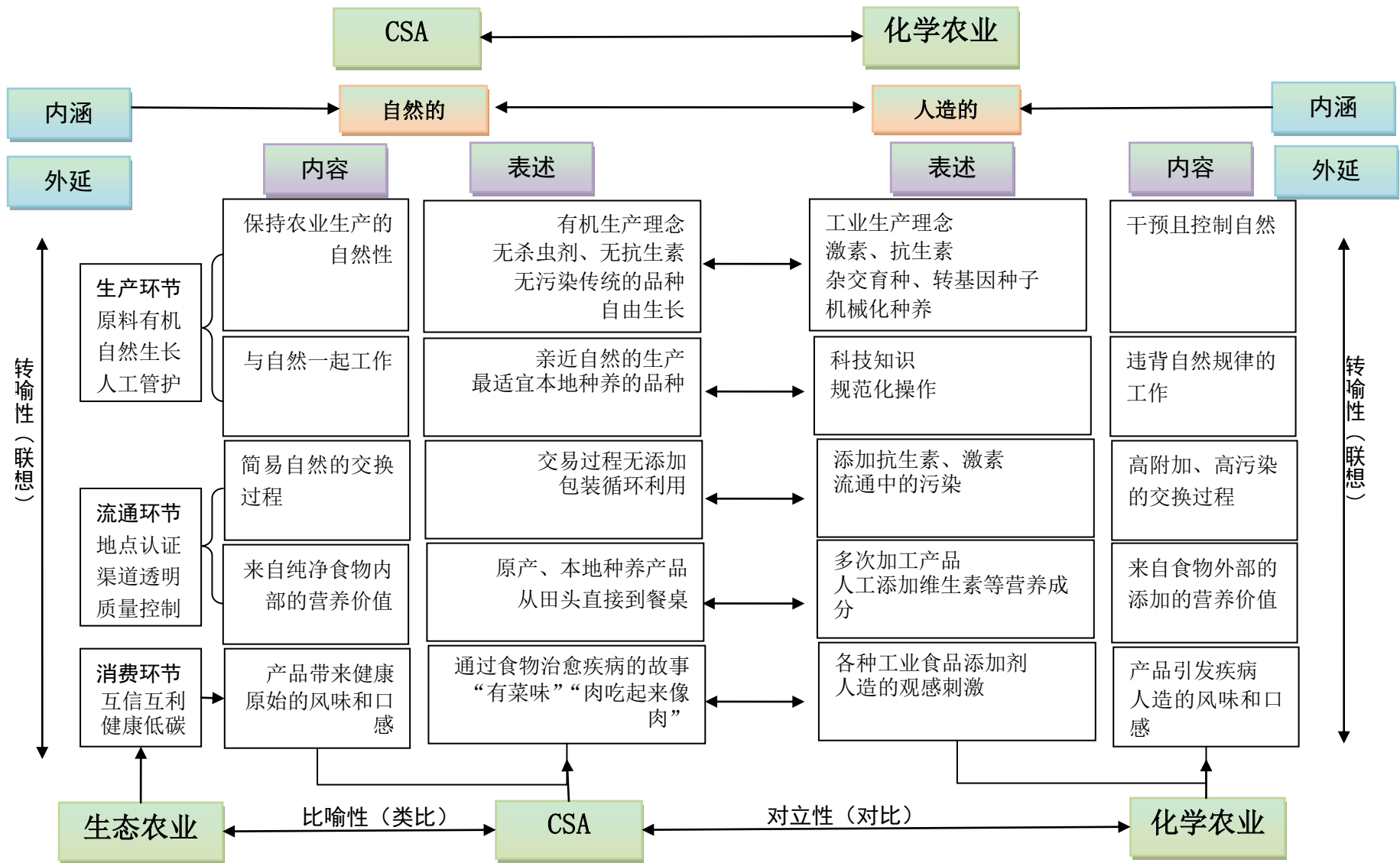


图 5 自然性 VS 造作性



3. 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其话语体系的认同

上文分析了 CSA 运动的话语体系，从中可以发现对食物真实性、利他性和自然性层面的价值认同是识别和动员 CSA 参与者的标志。接下来，本文通过对 CSA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动机进行分析，以阐明 CSA 的参与者对其话语体系的认同。本文通过对 CSA 的生产者进行案例访谈，以及对 CSA 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后发现，CSA 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动机与 CSA 动员话语的内涵有很高的一致性，这表现了 CSA 的参与者对 CSA 文化价值的认同，且 CSA 的参与者不仅认同其话语体系所代表的文化价值，更是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共同推动了 CSA 的发展，这也是 CSA 话语体系动员能力的体现。

（1）社区支持农业生产者的进入动机和价值认同

本文选择七个 CSA 生产者的访谈案例，详细阐述该生产者转向 CSA 生产的动机。

① 以小农为生产主体的社区支持农业——为了健康和安全

案例一：C 女士，北京顺义的一名普通农家妇女，自种田以来就一直坚持传统的农业耕作生产方式，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在 2010 年之前，她都是自己种菜自己吃，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找到她，要求购买她种的菜。当问及为什么转向经营 CSA 时，C 女士说：

“把好吃的东西带给更多人吃，活着开心！”（家庭农场主 C 女士语）

案例二：鑫农夫庄园的农场主 T 先生与 C 女士的情况比较相似，他和他的妻子自从种地以来就不使用农药化肥，在多年之前就发现周围的农户种菜化肥、农药用的厉害，他俩认为这种蔬菜肯定对身体有害，自从看了国家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注水猪肉、各种添加剂等工业化的东西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这促使了鑫农夫想去种植安全健康的食物，于是二人就从自己做起，转向生态种植的 CSA，起初种植的农产品都送给亲戚朋友吃，带给亲人朋友健康；之后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突出，夫妇俩认为应该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的食物，因此扩大了农场规模，搞起了 CSA，也让城里人吃上健康的食品。T 先生说：

“虽然生态种植的产量比较低，但是它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代表着美丽中国。”（鑫农夫庄园 T 先生语）

案例三：美田农场是一个名叫 L 的年轻女性管理运营的，她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熟知自然食物的味道，长大之后她曾一度在北京从事医药销售代表的职务，但是在城市里她发现吃的食物质量太差，味道不对，而且城市的环境也非常糟糕，加之 2010 年前后爆发的食品安全恶性事件，L 女士首先觉得应当关注自己及家人的饮食健康，于是毅然回到老家种起了庄稼，起初的蔬菜也都是送给亲戚朋友，之后农场产量有富余，L 女士就经营起了 CSA。

由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以小农自发经营的 CSA，其生产者大多是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的理念，近年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继而转向了 CSA 的经营，这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 CSA 利他性文化价值的认同。

② 以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社区支持农业——关注村民和城市人的健康

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是河北省张家口怀安县的农民合作组织，促进会的理事长 Z 女士是当地发起 CSA 经营的第一人。当问及 Z 女士当初为什么会转向 CSA 的生产经营方式，Z 女士回答说：

“那是前几年，我发现我们村得病的人非常多，特别是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我就琢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来想去我感觉是吃的东西有问题，于是就着手做出改变。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找来附近的几家农户商量，觉得是农药、化肥的问题，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但是没有人行动，大家都不敢冒风险。于是我决定第一个尝试，第一年，确实挺困难，产量降低了，但是我没有放弃，我使用农家肥改善土壤，做了很多土地方面的工作，嘿，到了第二年，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到现在产量一点都不低于使用化肥的农田。我们种的是大田粮食，之后我就带动更多的农户加入到我的队伍中来，并且成立了农业示范园，组织了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安全生产中来，并且我的理想是，不仅让自己村里的人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还得把健康带给城里人，让城市人个个吃上健康的食品。”（“一墩青”理事长 Z 女士语）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Z 女士开始了 CSA 的经营，怀着让城里人吃上健康食品的美好愿望，她组织当地的农民进行生态种植，且当前一墩青的马铃薯、谷子等特产已经成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招牌产品。

从 Z 女士创办一墩青的历程可以看出，她最原始的动机就是关注村民的健康，之后 Z 女士想到的是城里人的健康，她希望把安全与健康带给社会中的人们，这也体现了其对 CSA 利他性价值的认同。

③ 以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社区支持农业——关注健康，践行信仰

案例一：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是 J 女士十年前创办的，J 女士是建材经销商，现在北京有 8 个建材厂。2002 年，J 接触了佛学，信仰了佛教，更深刻的体会到了人性的重要性。她主张人性的回归，主张自然的食物和自然的生活，为了将佛家的仁爱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规律的精髓传播扩散，她从食物着手建立生态农庄，并依托农庄开展多种活动，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培训班，现已成立了 3 个教育基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问及 J 女士为什么转向 CSA 的生产经营时，J 女士回答：

“我主张仁爱，并倡导尊重自然，而农业是最贴近大自然的，我希望能通过种植果树与大自然交流，并在生活中践行佛学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仁爱、友善的精神。”（乐和仙谷有机庄园 J 女士语）

案例二：三分地有机农场创立于 2010 年，虽然起名为有机农场，但农场并未经有机认证，只是按照生态农业的操作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农场主 L 女士在 2010 年与其两个好友一起创办了三分地有机农场，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其他两位合伙人因为农场亏损而退出，但是 L 女士一直坚持将三分地有机农场运营下去。当问及 L 女士当初选择经营 CSA 的动机是什么，她回答说：

“最起初是因为我儿子，2010 年那会，我的儿子三岁，但是那时漫天的新闻报道都是食品安全恶性事件，我实在不放心现在的吃的，加上我是中国农大农学毕业的，我决定自己开农场，采取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模式。现在，农场运营三年，其实都是在亏损，但是我一直坚持，一是由于我坚信安全食物的重要意义，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前景广阔；二是要对得起我的会员对我的信任，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把农场做下去。”（三分地有机农场 L 女士语）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市民个人或合伙创办 CSA 的动机有可能是关注食品安全，关注身体健康，也有可能是践行自己的信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 CSA 自然性、真实性和利他性层面的价值认同。

④ 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社区支持农业——城乡互助，互利共赢

这一类型的 CSA 的典型代表就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据其负责人 S 先生介绍，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前身是河北保定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问及创立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动机时，S 先生表示：

“2008 年之前，我们一直在生态种植主粮，因为主粮可以长途运输，但是在发生了众多食品安全事件后，我们决定开始做蔬菜种植，保障食品安全。但是发现蔬菜从保定运到北京的距离过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发现国外有一种新的模式——社区支持农业，于是就派石嫣出国学习，之后在北京运作这一模式，在各方的支持下，包括香港社区伙伴（PCD）、海淀区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运作起来。简单的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立动机除了保障食品安全，还有更深次的包括推动生态农业、城乡互助、建立互信等精神价值”（小毛驴市民农园 S 先生语）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产者在经营之初拥有更为公共层面的价值关怀，关于城乡互助、建立互信等方面的追求，更是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 CSA 三个层面文化价值的认同。

（2）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的进入动机和价值认同

CSA 消费者的进入动机与其对 CSA 文化价值的认同亦是紧密相关。在调研中发现，消费者选择成为 CSA 会员的动机都较为统一，多数人都是为了安全、健康的食品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有少数消费者会提到为了支持农民，为了城乡互助。在谈及 CSA 的文化价值时，被访者都会认同 CSA 的理念，并表现出对 CSA 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层面意义的追求。

① 案例一：“放心”、“好吃”与“顺应自然”

作者在崇文门新世界百货三层调研过程中参与到了“三分地”有机农场的 L 女士与其一名老会员 A 的对话中。A 是一位中年女性，在北京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中层领导职务，成为“三分地”的会员已经两年了。A 说她与刘场主的关系非常好，刘场主每次送菜都会多给她带上一些。当问及 A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吃农场食物的时候，A 说到：

“现在市场上的东西都太不安全了，我一直试图寻找生态种植的食物，直到在微博上看到社区支持

农业的信息，对这种生产模式和价值追求都十分认同，因此选择了尝试”。A 女士指出：“虽然农场的菜价高了些，但吃着放心，而且味道正宗。就拿西红柿来说吧，从我来到北京，就没再吃过这么香甜的西红柿。”此时 L 女士接着应答道：“谢谢啊，我们农场的西红柿种子都是用的过去 80 年代的品种，没有经过那种皮增厚技术的改良，所以我们的西红柿不太好运输，容易破损，但是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A 女士又谈到，“我们这两年都是吃农场供应的应季蔬菜，我自己感觉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更加顺应大自然四季的变化，比如说我在冬天就不想吃西红柿，但到了夏天自己就不知不觉的想吃，我认为这应归结为身体自然的反应；还有就是我儿子这几年吃了应季新鲜的蔬菜都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吃零食了，我怀疑是之前儿子吃了太多含有添加剂的食品，扰乱了孩子身体对食物最自然的需求。”(A 女士与 L 女士的对话)

从 A 女士的案例可以看出，对安全食品的追求是 A 女士选择 CSA 的主要动机，而正是因为 A 女士认同 CSA 自然、真实、健康、安全等层面的价值，A 女士才会一直忠于 CSA 的产品。

②案例二：“安全”、“健康”与“相互信任”

在红山世家调研过程中，作者参与到了“一敦青”L 女士卖黑豆皮、小米的生意当中，在买卖过程中认识了一位 B 先生。B 先生是教育部退休的老干部，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会员，在了解了笔者的调研意图后，B 先生表示他当初选择 CSA 的原因是他的女儿怀孕了，他不放心市场上卖的菜，担心有农药，而当时恰好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新闻，新闻里对 CSA 进行了介绍，并明确指出了农场的产品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于是 B 先生就渐渐关注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现在他的外孙女已经出生了，但是他觉得为了孙辈的安全，他会继续选择 CSA。在问及 B 先生为什么相信 CSA 时，B 先生表示，他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经过他对京郊众多 CSA 农场的调查，他感到很震惊，他发现所有的生产者都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兢兢业业的从事农业生产；在之后与生产者众多的交往之中，B 先生已经充分信任了生产者，也认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追求。

4. 社区支持农业的动员机制

通过上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 CSA 的动员机制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特定的话语和符号，将 CSA 与工业化农业相区别，并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语体系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促使二者进入到 CSA 的生产和发展中来，促进了 CSA 的发展。具体来说，当前我国出现了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一方面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者也认识到了石油、化学农业的危害，转而从事生态农业生产；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一群生态农业的先行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石嫣、程存旺等人从国外带回了 CSA 的生产经营模式，并按照中国传统的生态农耕方式进行生态农业的尝试和探索；与此同时，CSA 的生产者发展出了一系列标签，以区别 CSA 的食物和主流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食物，继而就出现了上文总结的体现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的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清楚的区分了 CSA 与工业化农业的边界，并吸引着更多的认同这一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随着 CSA 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的传播，更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加入到 CSA 中，并共同推动了 CSA 的发展。

（二）中国社区支持农业运动的重要贡献：另类食物体系的建立

Weber, Heinze & DeSoucey (2008) 指出，社会运动可以为新市场的开创解决三个方面的挑战：刺激生产、创造集体生产者身份以及建立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由上文分析可知，CSA 通过倡导生态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吸引了一批生产者投入到 CSA 的生产当中，刺激了生产；并通过其特有的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话语体系，区分了 CSA 和工业化农业，为 CSA 的生产者打上了鲜明的标签，也就形成了 CSA 的集体生产者身份；对于建立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的问题，当前 CSA 的生产者都是采用配送的方式将会员订购的食物送至其家中，这种短途配送保证了食物的新鲜和营养，也是 CSA 建立“本地食物体系”的证明。在 2012 年底第四次全国 CSA 大会上，与会的全国各地的 CSA 生产者代表纷纷提议建立统一的 CSA 配送渠道，并成立全国 CSA 互助平台。由此可见，CSA 不仅刺激了生态农产品的生产，建立了生产者的集体身份特征，还实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在 CSA 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现有工业化农业食品市场的，新的可替代性食品市场。通过实地调研及二手资料的分析，本文认为，CSA 提供的食物具有

五个特点，它们是自然的食物、纯净的食物、真实的食物、公平的食物和可持续的食物，因此在当前工业化农业占主流地位的时期，CSA 为人类社会提供另一类食物体系。这种食物体系可以为其参与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符合当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因而成功开创了一个新的市场份额（见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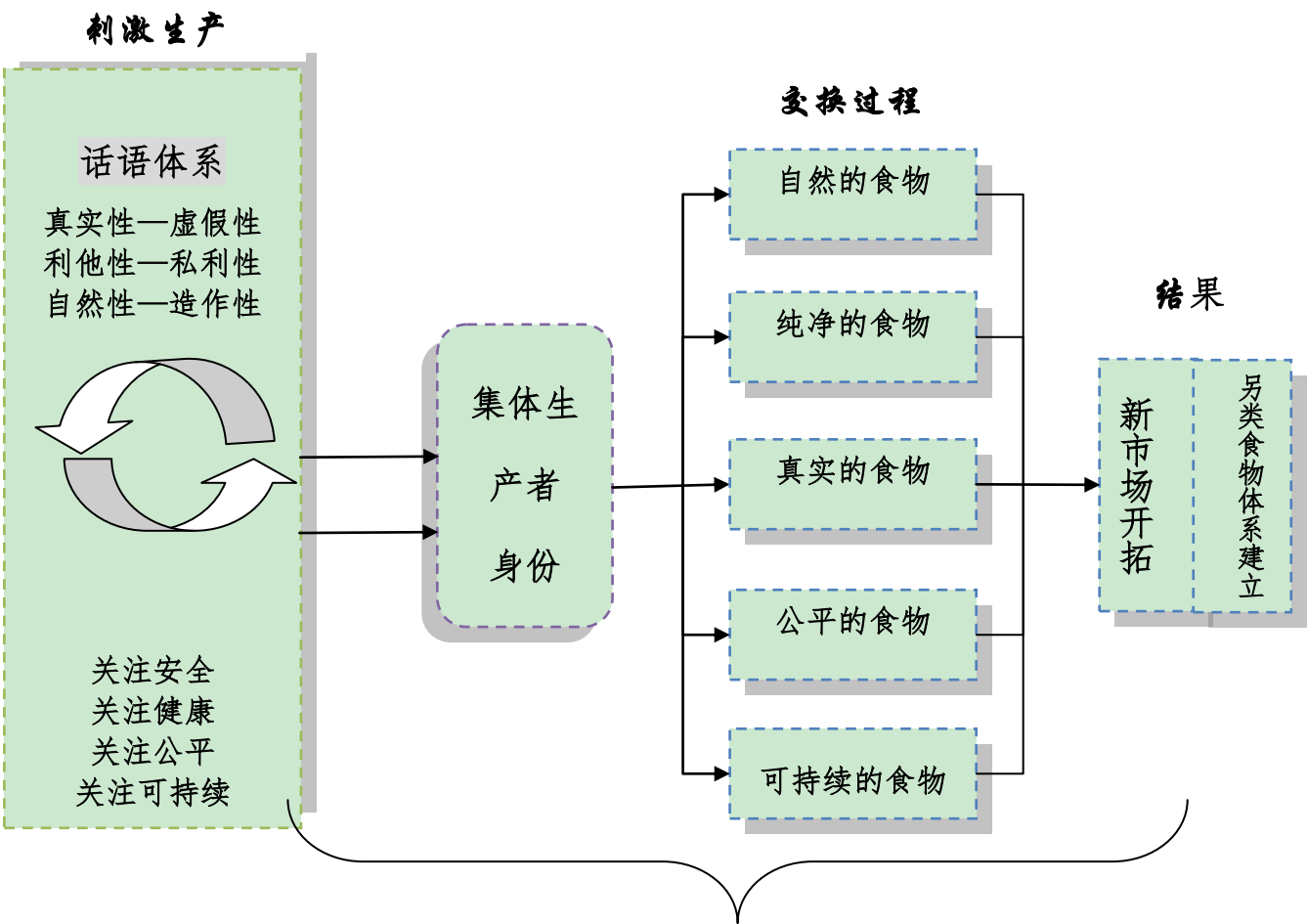


图 6 社区支持农业开创“另类食物体系”的过程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中国 CSA 的发展为例，对我国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发展机制和重要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与国外 CSA 的发展机制不同，中国 CSA 运动的发展不是依靠国内强大的 NGO 和消费者组织，其发展机制是在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的背景下，通过动员特定的话语和符号，将 CSA 与工业化农业相区别，并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语体系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促使二者进入到 CSA 的生产和发展中来，促进了 CSA 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拥有话语动员的能力，并通过吸引有着“文化共鸣”的人加入到运动中，而不断促进运动的发展。第二，CSA 运动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它生产了与主流工业化农业相区别的食物，形成了一个新的集体生产者身份，搭建了 CSA 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换的平台，促进了一个新的市场份额的产生，这与国外 CSA 运动的影响相似，而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带有一定的道德价值特色，并通过对传统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的批判，建立了新的认知体系，开创了新的市场份额，这是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特殊贡献。

本文可能有的贡献在于，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弥补了我国文献中对社会运动的研究限于政治领域的不足，基于更宽泛的社会运动的概念对我国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和重要影响进行研究；二

是在研究方法方面，运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抽象出我国 CSA 运动的话语系统，继而总结其动员机制，并据此分析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发展机制；三是在研究结果方面，以中国 CSA 的发展为例，关注了我国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曲折过程，并通过对其突破困境，重获发展的分析，发现了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一种力量之所在——话语动员和价值认同，并总结出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特殊贡献——开拓新的市场份额。

与世界“本地食物运动”一致，中国的 CSA 运动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趋势。本文认为，我国的 CSA 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在未来会得到持续不断地发展，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危机大爆发，引发了全社会的信任危机，这为以提供“自然、纯净、真实、公平、可持续”食物为宗旨的 CSA 运动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二是我国有着上千年精耕细作的农耕文化，传统的农作技艺和耕作方法为实现 CSA 模式的本土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 CSA 运动所拥有的“真实性、利他性、自然性”的话语体系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认同，当这种理念逐渐渗透多数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时候，我们相信中国的食物体系将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将会受到“本地食物运动”缓慢但深刻地“冲击”，正如当前发生在美国的情况一样。当然，作为一种由理想主义者发起的食物运动，CSA 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这也相应的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CSA，更多的研究中国 CSA 运动的现在和未来。

最后，本文提出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方向。在我国，对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研究还较少，本文仅以 CSA 为例，尝试对市场领域里社会运动的动员机制和市场创新进行研究，得出一些较为基础的结论。未来，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可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影响我国 CSA 成功发展的原因，CSA 的成功发展除了与其特殊的话语体系和文化动员有关，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二是可以关注 CSA 的发展带来的政治机遇，CSA 对当前的工业化农业食物系统带来了冲击，这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制度有无影响，当前主流的精英有无对该运动进行反击？三是关于 CSA 话语系统的发展和变迁，由于当前只是我国 CSA 发展的初期阶段，其话语体系是否会随着 CSA 运动的发展而改变？CSA 的参与者是怎样避免其话语体系被更为主流化的有机农业等运动同化？最后是关于 CSA 的组织发展问题，之前的 CSA 生产者是零星分布于中国的各个省市，但 2012 年底，第四届全国 CSA 大会决定成立全国 CSA 互助平台，这一组织联盟会对 CSA 运动的后续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也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陈卫平、黄娇、刘濛洋，2011，《社区支持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农业展望》第 1 期。
- [2] 第四届 CSA 大会，2012，《爱生活·爱故乡 第四届 CSA 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 [3] 刘飞，2012，《制度嵌入型与地方食品系统——基于 Z 市三个典型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案例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4] 佩特里尼，2010，《慢食运动》，尹捷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 [5] 施芸卿，2007，《机会空间的营造——以 B 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6] 石嫣，2012，《工业时代的食物社区再造》，《绿叶》，第 8 期。
- [7] 温铁军，2006，《食品安全背后的污染问题》，《文汇报》12 月 1 日。
- [8] 温铁军、董筱丹、石嫣，2010，《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农业经济问题》第 10 期。
- [9] 伊丽莎白·亨德森、罗宾·范·恩，2012，《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石嫣、程存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0] 应星，2007，《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 [11] 张磊，2005，《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察》，《社会学研究》第 6 期。
- [12] 赵鼎新，2005，《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社会学研究》第 1 期。
- [13] 朱清海，2012，《低碳环保：西方农业食品文化运动的新理念》，《生态经济》第 9 期。
- [14] Barley, S. R. 1983, "Semiotics and the study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3).
- [15] Benford, R. D., & 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1).
- [16] Carroll, G. R., & A. Swaminathan 2000, "Why the microbrewery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resource partitioning in the U.S. brewing indust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3).
- [17] Chaves, M. 1997, *Ordaining women: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8] Cooley, J. P., Lass, D. A. 1996, "Consumer benefits from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membership."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 (1).
- [19] Davis, G. F., McAdam, D., Scott, W. R. & Zald, M. N 2005, *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 Davis, Morrill, Rao & Soule 2008, "Int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s i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3(1).
- [21] Dawn Thilmany, Craig A. Bond, & Jennefer K. Bond 2008, "Going Local: Exploring Consumer Behavior and Motivations for Direct Food Purchases."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0(5).
- [22] Delind, L.B., Ferguson, A.E. 1999, "Is this a women's movement? The relationship of gender to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Michigan." *Human Organization* 58(2).
- [23] Donahue, T.P. 1994, "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Opportunities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5(2).
- [24] Feenstra G W. 1997, "Local food system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12(1).
- [25] Fligstein, N. J. 1996, "Markets as politics: A political-cultural approach to market institu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4).
- [26] Fourcade-Gourinchas, M., & K. Healy 2007, "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3(8).
- [27] Frickel, S., & N. Gross 2005, "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4).
- [28] Gamson, W. A 1975, *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 Homewood, IL: Dorsey.
- [29] Goodwin, J., Jasper, J. M., & Polletta, F. (Eds) 2001,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0] Greimas, A.1983, *Structural Semantics: An Attempt at a Method*. D. McDowell, R. Schleifer, and A. Velle, trans. and ed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31] Hank Johnston & Shoon Lio 1998,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stmodern Age: Looking Backward to Look Forwar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1(3).
- [32] Hargrave, T. J., & A. H. Van de Ven 2006, "A collective action model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1(4).
- [33] Johnston, Hank & Shoon, Lio 1998,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Postmodern Era: Looking Backward to Look Forwar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1(3)
- [34] Katzenstein, M. F. 1998, *Faithful and fearless: Moving feminist protest inside the church and the milita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35] King & Soule 2007, "Social Movements as Extra-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 The Effect of Protests on Stock Price Retur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3).
- [36] King, Bentele, & Soule 2007, "Protest and policy making: Explaining fluctuation in congressional attention to rights issues, 1960–1986." *Social Forces* 86(1).
- [37] Kolodinsky, J.M., Q. Wang, & L. Pelch 1999,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 Hypothesis Test of Membership Activities and Util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AEA annual meeting, Nashville TN, 8–11 August.
- [38] Lass, D., A. Brevis, G.W. Stevenson, J. Hendrickson, & K. Ruhf 2003,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Results from the 2001 National Survey." Amherst, MA: Dept. of Resourc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 [39] Lounsbury, M., M. J. Ventresca & P. Hirsch 2003, "Social movements, field frames and industry emergence: A cultural-political perspective on US recycling." *Socio-Economic Review* 1(1).
- [40] Local Harvest 2013, real food, real life, real community (<http://www.localharvest.org/search.jsp?&ty=6&nm=>).
- [41] McAdam, D., Tarrow, S., & Tilly, C 1996, "To map contentious politic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1).
- [42] McAdam, D., Tarrow, S., & Tilly, C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 Melucci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3] Moore, K 1996, "Organizing integrity: American science and the cre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organizations, 1955–197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6).
- [44] O'Hara, S.U., Stagl, S. 2001, "Global food markets and their local alternatives: a socio-ecolog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22(6).
- [45] Ostrom, M.R 2007,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s an Agent of Change: Is It Working?" In C. C. Hinrichs and T.A. Lyson, eds. *Remaking the North American Food System: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46] Perez, J., P. Allen, & M. Brown 2003,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on the central coast: The CSA member experience." CA: Center for Agroecology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 [47] Rao & Giorgi 2006, "Code breaking: How cultural entrepreneurs exploit cultural logics to generate institutional chang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7(6).
- [48] Rao, H. & S. Giorgi 2006, "Code breaking: How cultural entrepreneurs exploit cultural logics to generate institutional change."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7(1).
- [49] Rao, H., C. Morrill & M. N. Zald 2000, "Power plays: How social movemen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create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2(6).
- [50] Rao, H., P. Monin & R. Durand 2003,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 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4)
- [51] Schneiberg, M. 2002, "Organization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forms: Politics, social movements and mutual companies in American fire insurance, 1900–1930." In M. Lounsbury & M. J. Ventresca (ed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19(19).
- [52] Siobhán O'Mahony & Beth A. Bechky 2008, "Boundary Organizations: Enabling Collaboration among Unexpected All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3(3).
- [53] Snow, D. A 2004, "Social Movements as Challenges to Authority: Resistance to an Emerging Conceptual Hegemony."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25(1).
- [54] Snow, D. A., & R.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 [55] Snow, D. A., S. A. Soule, & H. Kriesi 2004, "Mapping the terrain." In D. A. Snow, S. A. Soule, and H.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3–16*.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 [56] Swedberg, R. 2005, "Markets in society." In N. J. Smelser and R. Swedberg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33–25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57]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 [58] Tarrow, S. G 1998,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2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9] Taylor, V. 1996, *Rock-a-bye baby: Feminism, self-help,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New York: Routledge.
- [60] Tilly, C 2004,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Boulder, CO: Paradigm
- [61] Weber, Heinze & DeSoucey 2008, "Forage for Thought: Mobilizing Codes in the Movement for Grass-fed Meat and Dairy Produc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3(3).

Quiet Revolution: Social Movement in Market Domain Which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lternative Food System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in China

Zhang Jing Zheng Fengtian Ni Guohu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f social movement includes collective challenges within and to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domains other than just the state or polity domain. This paper takes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social movement in market domain instead of the state. CSA is a typical social movement in market domain, and in China, it emerges in the context of food security crisis, doesn't rely on the support of NGOs and consumer organizations, makes big breakthrough, establishes the alternative food system and show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social movement in market domain. Semiotic chai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tract the CSA's discourse, and to analyze it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and market imp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CSA movement in China has the ability to mobilize discourse and by attracting the people who has a "cultural reson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 CSA has market impact that is in China it can establish new cognitive system, and create new market share by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SA and points out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which can be focused on the changes of CSA discourse,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CSA, and th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of it.